

【通论卷】

丛书主编 张燕瑾 赵敏俐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Selected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赵敏俐 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Selected Studi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 通论卷/张燕瑾, 赵敏俐丛书主编; 赵敏俐选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097-1166-8

I. ①2… II. ①张… ②赵…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1342 号

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通论卷

丛书主编 / 张燕瑾 赵敏俐

选 编 / 赵敏俐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薛 义 柳 宪

责任校对 / 张茂涛 蔡满虎 薛凤波

责任印制 / 岳 阳 郭 妍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排 版 / 北京春晓伟业

印 刷 /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 / 16

印 张 / 33.5

字 数 / 648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166-8

定 价 / 1680.00 元(共十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赵敏俐

本卷所选，是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通论性质的论文。这里所说的“通论”有两种含意，第一是指从整个编辑体例来讲，无法纳入按历史分期所选编的各卷中的论文，第二是这些论文所讨论的大都是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宏观理论方法性的问题和某些比较重要的具有跨时代特征的古典文学现象。从这些论文中，我们也许可以更好地看到 20 世纪以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总的发展进程和研究特点。

按性质来讲，选入本卷中的文章大体可分为四组主题。第一组是几篇 20 世纪早期到中期的学人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新认识的文章，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段古代文学研究的主导性的思想潮流以及其发展阶段的变化。按时间先后来讲，我们可以把这一组文章再细分为三种类型，大体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文章代表了 20 世纪初学人们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在这里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刘师培的《〈论文杂记〉序》。从刘师培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 20 世纪初的学者，他们对古代文学的认识已经开始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论文杂记〉序》一文中，刘师培首先就从西方传来的语法学切入来论述中国的“文学”，并深受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他认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字的“由文趋质，由深趋浅”同步，乃是“天演之例”，“此正进化之公理”。刘师培虽然不是一个特别赞成俗文学的人，但是他却认识到“故就文字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他说：“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刘师培的《〈论文杂记〉序》虽然从主体上讲仍是按传统的方式对中国古

代文学的发展线索进行的梳理，但是因为他注意到了文字的变化与文学变化之间的关系，而这最终又与中国古代的各种文体相关，所以他的这篇文章，也可以看做是一篇从文字发展与文体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所作的一篇系统的中国文学发展概论，标志着 20 世纪学人对中国古典文学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发表于 1906 年的王国维的《文学小言》，虽然篇幅短小，同样体现了当时人对于文学的一种新看法。王国维在此文中明确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的观点，这是对传统的“文以载道”说的一种批判。用这种文学观，王国维独推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文学天才，并对《三国演义》给以极高的评价。当然，王国维在此文中对戏曲的评价不高，这种观点后来在他的宋元戏曲史中有了重要修正。同时我们在这里还选录了章太炎的《文学总略》一文，此文出自于《国故论衡》，文章中的观点非常典型地代表了中国古代学者对于“文学”的基本看法。我们可以把此文看成是传统学术在 20 世纪初的延续。第二阶段的文章以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为代表。此文发表于 1917 年，那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端。严格来讲，陈独秀这篇文章是为他的文学革命主张而作的，其目的是为了说明文学革命在中国现代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意义，但是却在客观上对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学进行了一次具有颠覆意义的价值评估。他认为几千年的中国文学本是从“多里巷猥词”的《国风》和“盛用土语方物”的楚辞开始的，可是从两汉赋家以后却逐渐脱离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变为“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直至明清前后七子和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出，十八妖魔独霸坛，使盖代文豪如马致远、施耐庵、曹雪芹等几不被人所知。因此现在要对这种现状来一个大颠倒。与陈独秀相呼应的是胡适等人的系列文章，在这里我们选了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更为系统地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的现象对陈独秀的文章进行了支持。可以说，正是五四学人的这种观点，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使白话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研究得到了大发展，改变了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格局并指引了新的方向。第三个阶段的文章以游国恩的《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何其芳的《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以及胡念贻的《研究古典文学与批判继承遗产》为代表。其中游国恩的文章是他参加 1956 年教育部组织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大纲后的一些体会，何其芳的文章则是 1959 年 6 月 17 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而胡念贻的文章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年有关古典文学研究状况的历史回顾。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那个时期对中

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看法以及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体例问题、分期问题、艺术性问题等。其核心则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它进行新的价值重估问题。总之，从刘师培的文章到胡念贻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看法的历史变革过程，这对于我们在新世纪重新认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组是从多角度解释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现象和艺术特质方面的文章。以时间的顺序，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是他的《南北文化不同论》中的一节，这是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文学提出的新看法，在 20 世纪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接下来是梁启超的两篇文章，其中《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最初发表于 1921 年，这本是关于中国佛教史的一篇论文，文中阐述了佛经翻译的历史、代表人物、翻译的组织、文体的讨论等，并论及其对中国语言和文学的影响有三，第一是“国语实质之扩大”，第二是“语法及文体之变化”，第三是“文学的情趣之发展”，这实际开启了 20 世纪中国佛教文学研究的先河。梁启超的另一篇论文《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本为 1922 年春在清华学校文学社课外讲演之讲稿，后发表于 1922 年《改造》杂志上。论文认为天下最神圣的东西就是情感，它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所以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注重情感的陶养。而情感教育的最大利器，就是艺术：音乐、美术、文学。而他这篇演讲的重要目的，是要看中国韵文里情感表现的方法，并希望有人把它拿来与西洋文学比较，以便发挥民族文学的长处。梁启超把中国韵文里的情感大致分为奔迸的表情法、回荡的表情法、蕴藉的表情法、浪漫派的表情法、写实派的表情法几个方面。按梁启超原来的计划，此文除了对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进行仔细分析之外，他还要探讨文学里头所显的人生观和表情所用文体的比较。他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做完，但是他对中国韵文里表现情感的方法的分析却是超越古人的，同时体现了 20 世纪学人关于文学本质的新认识。发表于 1922 年的吴宓的《诗学总论》则是对中国诗歌特征所做的有独到之见的分析。作者认为诗与文的主要区别在于诗用切挚高妙之笔和具有音律之文两者，前者属于诗之内质，包括切挚之情与高妙的手法，后者属于诗之外形，这又取决于中国诗歌语言的特殊节奏韵律。这是本人所见到的中国学者第一次通过中西比较的方式对中国诗歌节奏韵律所做的系统分析，至今仍值得重视。接下来，郭绍虞 1926~1927 年发表的《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和《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同样是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章。其中第一篇，按其写作前言，明显地受到了刘师培《论文杂记》的影响，所不同的

是，郭绍虞在论述中国古代文体演变的趋势时，首先看重风谣在艺术起源方面的价值，这又是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郭绍虞认为中国后世的诗体都是以风谣为基础演进而成的，“由语言的质素以演成史诗（即叙事诗），由音乐的质素以演成乐诗（或抒情诗），更由于动作的质素而演成舞诗（或剧诗）。”而中国文学的其他文体，也都由此而逐渐衍生出来。把复杂的中国文体演进套进从风谣到史诗、抒情诗、剧诗再到其他文体的过程虽然过于简单和机械，但是郭绍虞这种关注文体演进的文学史眼光的确有些独到之处。而他的另一篇论文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与其含义的变迁，客观地指出了其从先秦到宋元以后的动态发展过程。我以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特别是在当下，由于许多人把古代的文学观与今天的文学观念混淆，并倾向于用今天的文学观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时候，重读郭绍虞的这篇文章，仍然会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俞平伯的《诗的歌与诵》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问题，该文的起源是对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诗除了可歌之外，还有一种不同于歌的诵法，由此进而探讨了乐的变迁、诗与乐的关系以及诵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其实，关于中国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诵诗的问题，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关系至大，但至今我们所做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从这一角度讲，这篇文章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朱光潜 1936 年发表于《国学季刊》上的文章《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同样是从语言发展的角度对中国文学进行的研究，所不同的是，这篇文章并不是以此来讨论文学史发展的趋势，而是在比较分析中具体阐释一种文体——律诗的形成过程。朱光潜认为，从中国早期的诗歌到律诗的形成，标志着从“自然艺术”转变到“人为艺术”。至于在具体的演化中，则主要包括这三个方面：第一是声音的对仗起于意义的排偶，这两个特征先见于赋，律诗是受赋的影响；第二是东汉以后，因为佛经的翻译与梵音的输入，音韵的研究极发达，这对于诗的声律运动是一种极强的刺激剂；第三是齐梁时代，乐府递化为文人诗到了最后阶段，诗有词而无调，外在的音乐消失，文字本身的音乐起来代替它。今天，关于中国律诗的产生问题的研究虽然比朱光潜的认识要深入得多，但是他的这篇文章仍有重要的开创价值。闻一多的《文学的历史动向》是一篇站在世界文化立场上来看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了文化汇合论的主张，强调了民族文学发展中外来文学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四个文明古国中，除中国文学之外，其他三种文学之所以没落了，“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

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闻一多的这一观点，在今天还值得我们深思。发表于20世纪40年代的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是另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按宗白华的说法，他之所以探讨这个问题，是因为“现代的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局面必将展开。然而我们对旧文化的检讨，以同情的了解给予新评价，也更形重要。就中国艺术方面——这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也是民族文化底自省工作”。可见，宗白华写作此文时带着很强的文化使命感。同时，也正是这种文化使命感，使他能够在比较宏通的文化艺术视野下来把握中国艺术（文学），对意境的问题作了极富诗意的探讨。今天我们重新阅读此文，我觉得还会有助于提高我们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艺术把握能力。同时，我们在这里也选了钱钟书的《通感》与《中国诗与中国画》两文。“通感”本是心理学和语言学的一个术语，指的是“感觉挪移”，这本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心理和语言现象，在文学创作中也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古今中外的文学家虽然很早就应用此法来进行写作，但是没人揭示。所以钱钟书的《通感》一文也为学术界所称道。其《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则是从艺术审美的多重角度对这两种姊妹艺术之异同所做的前所未有的系统分析。最后，我们选录了程千帆的《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这是作者结合哲学中的对立统一规律而对中国文学中一种特殊现象的揭示，对于我们分析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同样具有启示意义。总之，这组文章从几个方面标志着20世纪学人们对于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现象和艺术本质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其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是我们从宏观上深化中国古典文学认识的重要文章。

第三组是关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些具体现象的个案研究。以时间的先后记，发表于1927年的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是最有典型意义的一篇。孟姜女的故事是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故事之一，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但是在此之前，没有人对它进行过系统研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顾颉刚等人发起了搜集民间歌谣的活动，开始注意孟姜女的故事，最终经过几年的时间搜集整理而成为轰动文坛的论文。此文的价值不仅在于理清了孟姜女故事的来龙去脉，更重要的是开辟了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新领地，同时，也把民俗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当中来，因而具有多方面的典范意义。朱自清的《歌谣的起源与发展》一文，本是他1929~1931年在清华大学讲授《歌谣》讲义中的一部分。如果说，五四以后顾颉刚等人发起的歌谣学

运动是对于民间歌谣整理和抢救的实践，那么朱自清的《歌谣讲义》则是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歌谣所作的最为系统的研究，至今还没有超过它的系统性著作。我们这里所选的部分专论中国古代歌谣的起源与发展，从中可以看到 20 世纪学者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写成于 1941 年夏的冯沅君的《古优解》一文，则是对中国古代一类特殊的与文学和戏剧有关的人物——倡优所做的个案研究。作者在论述中国古代倡优的时候，首先借鉴了西方相关的研究和理论，然后用翔实的资料，探讨了古优的起源、古优的技艺、古优的特征、古优的影响等诸多方面，至今仍是研究先秦两汉文学和中国古代戏剧史不能不看的重要文章。另外，我们在这里还选入了王重民的《敦煌变文研究》一文。变文本是产生于汉魏时期的一种文体，盛行于六朝和隋唐五代时期，对宋元以后的文学也有重要影响。但是，直到敦煌变文被发现之后，才引起当代学人的重视。王重民参加了敦煌变文集的整理，对变文有多年的研究。文章首先对敦煌变文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新的分类，接着对“变文”之名称，变文的发生、发展和转变，讲唱变文的仪式和方法等做了详细的论述，最终对变文的特征和文学价值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篇文章，是关于敦煌变文研究的一个系统总结。通过以上几个实例，我们可以看出，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个案研究中所取得的最大成绩，主要都集中在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领域，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

第四组是一篇关于 20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文章和两篇有关文献考证方面的文章。宽泛地讲，我们所选的前三组文章也都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从不同方面代表着一种新的研究视野和新的研究方法。但是从 20 世纪开始，人们的确开始自觉地重视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通过我们这里所选的罗根泽的《学艺史的叙解方法》，我们可以略见一二。在这篇文章里，作者重点讲的是研究文学艺术问题的具体方法。作者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为例，将具体的方法分为叙述的方法和解释的方法两种，故总称为“叙解方法”。在叙述的方法中，作者认为最重要的有两种，一是述要，二是述创。所谓述要，也就是探寻要领，把握一个学者乃至一个社会的根本观念。而所谓述创，则包括纯粹的创造、综合的创造、演绎的创造和因革的创造四种。在解释的方法中，作者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种，那就是释义、释因、释果。释义主要有明训、析疑、辨似诸端；释因包括物、人、学三个方面；释果则有作家影响、社会影响、学艺影响三种情况。可见，作者在这里所列的研究方法是相当系统的，也具有相当强的可操作性。其实，无论我们在研究文学中要用到哪些理论

为指导，但是要进行研究，从操作层面上讲都必须遵循大致同样的原则。因此，罗根泽的这篇文章在今天仍然有方法论方面的重要参考意义。逯钦立的《〈古诗纪〉补正叙例》一文，本是他为《古诗纪》一书作补正时所采用的方法与原则，而在补正工作基本结束时作为此项工作的重要总结，不仅具体说明了自己在此项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和解决的问题，而且把它提升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校勘学方法写了出来，就对以后的文学校勘工作有了一定的指导意义。我们知道，20世纪是中国文学资料大发现的年代，在21世纪之初，王国维就根据出土文献等材料，在中国文学研究方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并提出了适用于文史学科研究的二重证据法。郑振铎的《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一文，系统总结了20世纪前期有关中国文学研究新材料的诸多发现。作者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新发现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影响，他说：“今日所要走的，乃是就许多新的资料的出现将文学史的局面重为审定的一条大道。”“有许多不被昔人所注意的名著，如今是受着盛大的欢迎。有许多已久被忘却却在尘土堆里的要籍，如今是开始被发现其重要。有许多不曾被文人们所接触过的野生的文艺，如今是要第一次地被搜采，被研究。有许多的辛勤苦作的伟大的文人们，有许多的天才绝顶的作家们，向来不曾被那一班修史的史臣们或正统派的士大夫们所回眸一顾的，如今也要轮到他们脱颖而出，占有着文坛的重要的一角站地了。”可贵的是，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文学新资料之发现，并不仅仅指那些新出土的地下文献，而且指因为文学观念和社会观念的变迁而带来的对许多过去不曾注意的纸上材料和民间材料等的重新重视，可见他的眼光的敏锐和思维的周详。如何正确地利用大量的新发现的文学材料，扩展和深化新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至今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郑振铎的这篇文章，在这方面也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受篇幅的限制和编写体例的约束，本卷所选，不过是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通论性质论文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把它们分为四个部分来进行介绍，并试图让读者从一个侧面看到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概况。我们的目标是尽量选择那些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文章，但是因为个人水平有限，以上所选篇目也许不一定合适，仅作为参考而已。不当之处，还望读者与专家们多多批评指正。

目 录

- 前 言（赵敏俐） / 1
-
- 《论文杂记》序（刘师培） / 1
- 南北文学不同论（刘师培） / 27
-
- 文学小言（王国维） / 33
-
- 文学总略（章太炎） / 37
-
- 文学革命论（陈独秀） / 42
-
- 文学革新申义（傅斯年） / 45
-
- 翻译文学与佛典（梁启超） / 53
-
-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 / 78
-
- 诗学总论（吴宓） / 133
-
- 孟姜女故事研究（顾颉刚） / 144
-
- 试从文体的演变说明中国文学之演变趋势（郭绍虞） / 172
-
- 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郭绍虞） / 182
-
- 歌谣的起源与发展（朱自清） / 193
-
- 诗的歌与诵（两篇）（俞平伯） / 230
-
- 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赋对于诗的影响（朱光潜） / 248
-
- 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下)：声律的研究何以特盛于齐梁以后？
（朱光潜） / 260
-
- 古优解（冯沅君） / 266
-
- 学艺史的叙解方法（罗根泽） / 308
-
- 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 / 317

- 《古诗纪》补正叙例（逯钦立） / 321
-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宗白华） / 347
- 中国诗与中国画（钱钟书） / 359
- 通感（钱钟书） / 379
- 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郑振铎） / 389
- 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几点意见（游国恩） / 412
- 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何其芳） / 421
- 研究古典文学与批判继承遗产（胡念贻） / 444
- 敦煌变文研究（王重民） / 472
- 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程千帆） / 504

《论文杂记》序

刘师培

西人分析字类，曰名词、代词，曰动词、静词、形容词，曰助词、联词、副词。名词、代词者，即中国所谓实字也。动词、静词、形容词者，即中国所谓半虚实字也。助词、联词、副词者，即中国所谓虚字也。予观孔子垂训，首重正名。而汉儒董仲舒亦曰：“名生于真，非其真无以为名。”盖实字用以名一切事务者，皆曰名词。字由事造，事由物起，故名词为文字之祖。中国小学书籍，亦多释名词。《尔雅》由《释亲》至《释畜》，以及刘熙《释名》，皆分析名词，字由类聚。是古人非不知名词之用也。至代词一类，皆以虚字代实字之用。吾观刘氏《助字辩略》，释“之”、“其”二字，训为指事物之称，且博引古籍，得数十条。是古人非不知代词之用也。《尔雅·释诂》三篇，大抵皆动词、静词。明人朱郁仪《骈雅》，则大抵皆静词、形容词。是形容词之用，先儒亦早知之。毛、郑释诗，多言状物。而江都汪氏之释“三”、“九”也，亦谓古人作文，多用形容之词，以示立义之奥曲。则静词、状词、形容词之用，古人亦无不知之矣。至助词、联词、副词，则上古之时，大抵由名词假借。其始也，由实字假为半虚实字：如“治”本水名，借为治国之治；“修”本段脯，借为修身之修；（此由实字假为动词者。）“薄”为林薄，借为厚薄之薄，“旧”为鸛鷖，借为新旧之旧（此由实字借为静词、形容词者。）是也。其继也，更由实字借为虚字：如“之”字、（草出地也。）“於”字、（孝鸟也。）“而”字、（颞颥也。）“所”字、（锯木声也。）“则”字、（等画物也。）“苟”字、（草也。）“维”字、（车盖系也。）“云”字、（山川气也。）“不”字、（鸟飞翔不下也。）“必”字、（弓檠也。）“莫”字（日且冥也。）是也。其借假之例，约有二端：一为由义假借：如“而”为颞颥，有下垂之义，故承上启下之字为“而”；“尽”为器中空，有穷尽之义，故凡物穷尽者皆为“尽”；“云”为山川气，故曰所出之语亦为“云”：其例一也。一为由声假借：本无其字，而读音与某实字音相近，因假借为之，如“於”字、“所”字是：（此与今日土俗有音无字者相似，姑借同声之实字以寄其字形。）其例二也。观此二例，则知虚字本无实义，故有一字数用者，亦有一数字一用者，每随文法为转移。近世巨儒，如高邮王氏、洛山刘氏，于小学之中，发明词气

学，因字类而兼及文法，则中国古人亦明助词、联词、副词之用矣。昔相如、子云之流，皆以博极字书之故，致为文日益工，此文法原于字类之证也。后世字类、文法，区为二派，而论文之书，大抵不根于小学，此作文所由无秩序也。

一

印度佛书，区分三类：一曰经，二曰论，三曰律。而中国古代书籍，亦大抵分此三类：一曰文言，藻绘成文，复杂以骈语韵文，以便记诵，如《易经》六十四卦及《书》、《诗》两经是也；是即佛书之经类。一曰语，或为记事之文，或为论难之文，用单行之语，而不杂以骈俪之词，如《春秋》、《论语》及诸子之书是也；是即佛书之论类。一曰例，明法布令，语简事赅，以便民庶之遵行，如《周礼》、《仪礼》、《礼记》是也；是即佛书之律类。后世以降，排偶之文，皆经类也；单行之文，皆论类也；会典、律例诸书，皆律类也。故经、论、律三类，可以该古今文体之全。惜后人昧其渊源，不知文章之派别耳。

二

英儒斯宾塞耳有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及观之中国文学，则上古之书，印刷未明，竹帛繁重，故力求简质，崇用文言。降及东周，文字渐繁；至于六朝，文与笔分；宋代以下，文词益浅，而儒家语录以兴；元代以来，复盛兴词曲：此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人文之渐。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人文之一级。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以本国语言用于文学，而国民教育以兴。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谰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

三

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鼻，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词》，忧深思远，上承

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惟文学臻于极盛，故周末诸子，卒以文词之美，得后世文士之保持，而流传勿失。（中国秦、汉以下文学之士，不知诸子之精深，惟好其文词而已。故近人所选古文，多以诸子入选。）则修词学乌可不讲哉？

四

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训“徒歌”，（《说文》“謠”字下云：“徒歌也。”戴侗《六书故》引唐本《说文》：“声謠，徒歌也。”《尔雅释乐篇》亦同。）歌者永言之谓也。（《汉书艺文志》云：“咏其声谓之歌。”）“谚”训“传言”，（《说文》云：“谚，传言也。”）言者直言之谓也。（《文心雕龙》云：“谚，直言也。”）盖古人作诗，循天籁之自然，有音无字，故起源亦甚古。观《列子》所载，有尧时谣，孟子之告齐王，首引夏谚，而《韩非子·六反篇》或引古谚，或引先圣谚，足征谣谚之作先于诗歌。（“谚”字从“言”，“彦”声。“彦”训“美士”。《说文》云：“有文人之所言也。”是谚为彦士之文言，非若后世之谚为鄙言俗语也。鄙言俗语为“谚”字引伸之义。）厥后诗歌继兴，始著文字于竹帛。然当此之时，歌谣而外，复有史篇，大抵皆为韵语。言志者为诗，记事者为史篇。史篇起源，始于仓圣。《周官》之制，太史之职，掌谕书名。而宣王之世，复有史籀作《史篇》，书虽失传，然以李斯《仓颉篇》、史游《急就篇》例之，大抵韵语偶文，便于记诵，举民生日用之字，悉列其中，盖史篇即古代之字典也。（《内则》云：“十岁学书记。”即史篇也。）又孔子之论学诗也，亦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诗歌亦不啻古人之文典也。盖古代之时，教曰“声教”，故记诵之学大行，而中国词章之体，亦从此而生。诗篇以降，有屈、宋《楚词》，为词赋家之鼻祖。然自吾观之，《离骚》、《九章》，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伤中路之夷犹，怨美人之迟暮，托哀吟于芳草，验吉占于灵茅，窈窕善怀，婵娟太息，诗歌比兴之遗也。《九歌》、《招魂》，指物类象，冠剑陆离，舆旌纷错，以及灵旗星盖，鳞屋龙堂，土伯神君，壶蜂雁虺，辨名物之瑰奇，助文章之侈丽，史篇记载之遗也。是《楚词》一编，隐含二体。秦、汉之世，赋体渐兴，（《荀子》已有《蚕赋》。）溯其渊源，亦为《楚词》之别派：忧深虑远，《幽通》、《思元》，出于《骚经》者也；《甘泉》、《藉田》，愉容典则，出于《东皇》、《司命》者也；《洛神》、《长门》，其音哀思，出于《湘君》、《湘夫人》者也；《感旧》、《叹逝》，悲怨凄凉，出于《山鬼》、《国殇》者也；《西征》、《北征》，叙事记游，出于《涉江》、《远游》者也；《鹪鸟》、《鹦鹉》，生叹不辰，出于《怀

沙》者也；《哀江南赋》，睠怀旧都，出于《哀郢》者也；推之《枯树》出于《橘颂》，《闲居》出于《卜居》，《七发》乃《九辨》之遗，《解嘲》即《渔父》之意：渊源所自，岂可诬乎？盖《骚》出于《诗》，故孟坚以赋为古诗之流。然相如、子云，作赋汉廷，指陈事物，殚见洽闻，非惟风雅之遗音，抑亦史篇之变体。（观相如作《凡将篇》，子云作《训纂篇》，皆史篇之体，小学津梁也。足证古代文章家皆明字学。）此古代文章之流别也，然知之者鲜矣。

五

箴、铭、碑、颂，皆文章之有韵者也，然发源则甚古。箴者，古人谏海之词也。（《书·盘庚篇》云：“无伏小人之攸箴。”《诗·庭燎序》云：“因以箴之。”《左传》载师旷之言曰：“百工诵箴谏。”）《文心雕龙》之言曰：“夏、商二箴，余句颇存。”（案《夏箴》见于《佚周书·文传篇》，《商箴》见《吕氏春秋·名类篇》，而《谨听篇》亦引《周箴》。）案周辛甲为太史，官箴王缺，而《虞人》一篇，列诸《左传》。则箴体本于三代也。铭者，古人勸励之词也。（《说文》云：“铭，名也。”）铭始于黄帝，故《汉志》道家类列《黄帝铭》六篇，厥后禹铭筭铉，汤铭浴盘，武王闻丹书之言，为铭十六，（见《大戴礼》。）而周代公卿大夫，莫不勒铭于器，以示子孙。（见金石书中所载。）故臧武仲云：“夫铭，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而《诗传》亦曰：“作器能铭，可以为大夫。”《考工记》亦曰：“嘉量有铭。”则铭体始于五帝矣。碑者，古人记功之文也。自无怀氏刻石泰山，为立碑记功之始。（《文心雕龙》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号封禅，树石碑岳，故名曰碑。”）而《穆天子传》亦言穆王纪迹于弇山。则碑体亦始于五帝矣。（古人记功之碑与丽牲之碑不同，见江都凌先生《小楼读书答问》。）颂者，古人揄扬之词也。《庄子》有言：“黄帝张《咸池》之乐，有焱氏为颂。”而《史记·乐书》亦曰：“黄帝有《龙袞颂》。”而帝嚳之世，盛墨为颂，以歌《九韶》。（见《文心雕龙》。）《诗》有六义，其六曰颂；《周颂》、《鲁颂》、《商颂》皆载《诗经》。则颂体亦始于五帝矣。推之志铭（如比干《铜盘铭》及孔子铭吴季札墓是。）诔辞之作，（如鲁庄诔县贲父、哀公诔孔子是。）皆起于三代之前，而皆为有韵之文。足证上古之世，崇尚文言，故韵语之文，莫不起源于古昔。阮氏《文言说》所言，诚不诬也。

六

刘彦和作《文心雕龙》，叙杂文为一类。吾观杂文之体，约有三端：一曰

答问，始于宋玉，（《答楚王问》）盖纵横家之流亚也；厥后子云有《解嘲》之篇，孟坚有《宾戏》之答，而韩昌黎《进学解》，亦此体之正宗也。一曰七发，始于枚乘，盖《楚词》《九歌》、《九辩》之流亚也；厥后曹子建作《七启》，张景阳作《七命》，浩瀚纵横，体仿《七发》，盖劝百风一，与赋无殊，而盛陈服食游观，亦近《招魂》、《大招》之作，（柳子厚《晋问篇》，亦七类也。）诚文体之别出者矣。一曰连珠，始于汉、魏，盖荀子演《成相》之流亚也；首用喻言，近于诗人之比兴，继陈往事，类于史传之赞辞，而俚语韵文，不沿奇语，亦俚体中之别成一派者也。三者而外，新体实繁：有所谓上梁文者矣；（出于《诗·斯千篇》。）有所谓祝寿文者矣；（始于华封人之祝尧。）而一二慧业文人，笔舌互用，多或累幅，少或数言，语近滑稽，言违典则，此则子云称为小技，而昌黎斥为俳优者也。古人谓“小言破道”，其此之谓乎。

七

西汉之时，总集、专集之名未立；隋、唐以上，诗集、文集之体未分。于何征之？观班《志》之叙艺文也，仅序诗赋为五种，而不及杂文；诚以古人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经》、诸子之中，非《六经》、诸子而外，别有古文一体也。如论说之体，近人列为文体之一者也，然其体实出于儒家。（九家之中，凡能推阐义理，成一家者，皆为论体；互相辩难者，皆为辩体。儒家之中，如《礼记·表记》、《中庸》各篇，皆论体也；《孟子》驳许行等章，皆辩体也。即道家、杂家、法家、墨家之中，亦隐舍论、辩两体。宣口为说，发明经语大义亦为说。《汉志》于发明经义之文，即附于本经之下。又贾谊《过秦论》三篇，亦列于《新书》，而《汉志》杂家复有《荆轲论》五篇，皆论体之列于子者也。）书说之体，亦近人列为文体之一者也，然其体实出纵横家。（如苏子、张子、蒯通、邹阳、主父偃之文，皆文章中之书说类也，而《汉志》咸列之纵横家中。）推之奏议之体，《汉志》附列于《六经》。（如《尚书》类列议奏四十二篇，《礼》类列议奏三十八篇，《春秋》类列议奏三十九篇、奏事二十篇，《论语》类列议奏二十篇；而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官列于儒家，博士贤臣对列于杂家，此又奏议类之附列诸子中者也。）敕令之体，《汉志》附列于儒家。（儒家之中，列《高祖传》十三篇，自注云：“高祖及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又列《孝文传》十一篇，自注云：“文帝所称及诏策。”此其确证。）又如传、记、箴、铭，亦文章之一体。然据班《志》观之，则传体近于《春秋》，（故太史公、冯商所著书列入《春秋》类也。）记体近于古礼，（如《周官经》、《古佚礼》、《大小戴礼》，皆记体之先声也。）箴体附于儒家，（儒家列杨雄三十八篇，有箴二篇，而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内，有《列女传颂》，